



曾棗莊 主編

宋代序跋全編

(一)

齊魯書社



曾棗莊 主編

宋代序跋全編

(一)

齊魯書社

凡 例

一、本書收集并分類彙編宋人單篇序、跋。

二、宋人有大量標題署爲“題名”的文章，因大部分都類似今人的“到此一游”，沒有什麼價值，故本書原則上不收。宋人單篇詩、詞、文（賦）有的前有序或後有跋，因其與詩、詞、文本身爲一整體，本書均不收錄。但宋人爲宋人單篇詩、詞、文（賦）寫的篇序或題跋則予以收錄。宋人有大量本人或後人編纂的題跋專書，本人編纂的題跋專書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曾鞏《元豐金石跋尾》、趙明誠《金石錄》、董道《廣川書跋》《廣川畫跋》、翟耆年《簡史》、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陳思《寶刻叢編》、鄭樵《金石略》等，本書不收；後人編纂的題跋專書如歐陽修《六一題跋》、曾鞏《元豐題跋》、蘇頌《魏公題跋》、蘇軾《東坡題跋》、黃庭堅《山谷題跋》、秦觀《淮海題跋》、李之儀《姑溪題跋》、晁補之《無咎題跋》、釋惠洪《石門題跋》、陸游《放翁題跋》、周必大《益公題跋》、朱熹《晦庵題跋》、樓鑰《攻媿題跋》、陳傅良《止齋題跋》、葉適《水心題跋》、真德秀《西山題跋》、劉克莊《後村題跋》、魏了翁《鶴山題跋》等，多從其別集中輯出，本書亦從其別集中收錄。

三、本書分序和題跋兩部分。

四、序分書（篇）序、贈序、字序、記序（雜序）四類，各類中包括雖無“序”之名而實爲此類序文的文章（如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陳傅良《舟說》、劉敞《劉景烈字解》、王令《交說送杜漸》、蘇軾《日喻贈吳彥律》《太息送秦少章秀才》《稼說送張琥》、劉子翬《招劍文送劉致中》實爲贈序）；本書不收專書，但收專書序，如蘇轍《春秋集解引》等。每一類均以作者立目，以文繫人，按作者生卒年先後編排。

五、題跋不分類，含跋（跋某、某跋、跋尾、跋後）、題後（題某、題詞）、讀後（讀某）、書後（書某、後序、後錄）、後記（記後、記某）等，包括雖無“跋”之名而實爲題跋類的文章。亦以作者立目，以文繫人，按作者生卒年先後編排。

六、序跋的分類以及收錄的部分雖無“序”“跋”之名而實爲序跋類的文章，祇是編者根據文章內容及文體特徵進行的分類和選錄，尤其是部分記序（雜序）也可歸入書序或篇序，部分書序或篇序也可歸入記序（雜序），并無絕對標準。

七、所收資料，均擇善本爲底本。他本文字有異同，凡底本文義可通者，一律以底本爲準。底本確有誤，則據他本改正，并出校記。本書資料較多采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聲名一嚮不太好，原因之一是說它擅改原書，但這是人云亦云之說。《四庫全書》刪改的主要是涉及民族問題的部分，就其他方面而言，《四庫全書》是叢書中編得最好的一種，多數版本都是經過嚴格比較後選定的，內容較完整，錯字較少，這也是本書多用《四庫全書》作爲底本和校本的原因。

八、依據底本，原文中的夾注、夾批均予保留，并在原位用一小號字排出。各篇資料出處，皆詳注書名、卷次、版本，不用簡稱。本書凡引用叢書名，均不加書名號。《前言》之頁下脚注，凡同一書名同一版本前已有注者，後注祇出書名卷次，不再注明版本。

九、校記所涉版本，凡屬常見叢書（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武英殿本等）之別集，一般祇注叢書名，不出別集名。

十、書末附主要引用書目索引，按書名首字筆畫順序排列。

前 言

序、跋兩種文體雖然早在宋以前就已出現，但大量使用這兩種文體并取得很高成就，出現較多題跋專書，則是自宋代始。宋人序跋中的書序、篇序，集中體現了宋人的文藝觀及宋人對歷代文化和當代文化的繼承和整理，是研究宋代文化和文藝理論的重要資料；宋人的贈序文，則全面反映了宋人尤其是士大夫之間的交往和價值觀，是研究宋代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宋人的字序文，則最為集中地體現了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而宋人題跋，則是最能體現宋代文人多姿多彩的生活，最能體現宋人活力和靈性的文字，代表了宋代小品文的最高成就。因此，研究宋代文化和文學，離不開對宋人序、跋的整理和研究。下面分別介紹宋人序、跋的文體特徵、分類、內容及其藝術特色。

一、序體概述

以序名篇的文章至少有四類：

一為序跋之序，是寫在一部書或一篇文章前面的文字，呂祖謙《宋文鑒》卷八五至九二所收序文多數都是序跋之序。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序》云：“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有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小序》云：“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大序指全書之序，小序專指詩、文、詞、曲篇前之序。

二為字序之序，又叫字說、字解，雖以序名篇，但實為雜說。

三為記序之序，雖以序名篇，但實屬雜記文，如王羲之《蘭亭集序》、王勃《滕王閣序》、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等。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云：“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宋初李昉等編的《文苑英華》卷七〇八至七一一《游宴》類所收序，從王勃的《春日孫學士宅宴序》至白居易的《三游洞序》都是序記之序，是雜記文。宋代也有以序為記的雜記文，如趙湘《觀王巖彈琴序》、蔡襄《七石序》、王柏《默成賜硯序》等。

四為贈序之序，為送別親友而作，鄒浩《送史述古序》云：“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贈人以言。”^①“贈人以言”，多為贈詩，陳耆卿《送應太丞赴闕序》云：“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②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云：“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梁王觴諸侯于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為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姚鼐謂“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不確，晉人傅玄已有《贈扶風馬鈞序》，潘尼有《贈二李郎詩序》等。但贈序體確實是唐、宋纔盛行起來的。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引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

① 《道鄉先生文集》卷二七，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

② 《貧窗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前者指序跋之序，後者指贈序。又云：“近世應用，惟贈序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循人之失也。”這既說明了唐、宋以來贈序文之多，又說明贈序文宜“序其實”，切忌“枉己循人”。

這四類序，清以前的總集、別集多混收，不區分。姚鉉的《唐文粹》卷九一至九五所收序皆書序；卷九六至九八所收序則有記序，如獨孤及的《琅琊溪述序》、李白的《泛郎官湖序》；有贈序，如李白的《贈嵩山焦煉師詩序》、韓愈的《送陸歙州序》。北宋人編的《宋文選》按人收文，卷二收有歐陽修的贈序文《送梅聖俞歸洛序》、書序文《集古錄目序》、字序文《章望之字序》。南宋初呂祖謙編的《古文關鍵》既收贈序，如韓愈的《送王含秀才序》《送文暢序》；也收書序，如蘇軾的《六一居士集序》《錢塘勤上人詩集序》。樓鑰編的《崇古文訣》是按朝代、作者收文，收有書序（如卷八李漢的《昌黎文集序》）、贈序（如同卷韓愈的《贈張子序》）、記序（如卷二七曾鞏的《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南宋魏齊賢等編的《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二所收序也是混收書序（如程頤的《易傳序》）和贈序（如石介的《送龔鼎臣序》）。元、明情況類似，直至清人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纔把序跋之序與贈序之序區分為兩類。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凡例》又把贈序文歸入序跋類，他說：“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經史百家雜鈔·序跋類》收有韓愈的《贈鄭尚書序》《送李愿歸盤谷序》、歐陽修的《送徐無黨南歸序》等，都是贈序文。歷代總集除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外，幾乎都混收各種不同的序。但贈序之序和序跋之序實為不同性質的文章，贈序為贈人以言，序跋為敘述著作之意，贈序之序與序跋之序理應各為一類。

二、書序和篇序

序是寫在一部書或一篇文章前面的文字，用以評介該書或該篇詩詞文。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序》云：“《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一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姚勉認為序不必作，其《回張生去華求詩序》^①尖銳地提出了這一主張，批評時人多“借序為重”：“如自有膾人口之語，亦何資冠篇首之文”，“借序為重者，其格益下”，這是對求序者的規戒；“苟輕許可，彼亦妄人，與其稱三好以誤其一生，孰若效寸長以補其尺短？”這是對好作序者的規戒。此文對求序者、作序者均有鑒戒作用。但不僅姚勉之前已有很多序，姚勉之後仍有很多序。

經史子集各類典籍均有序。經書序如蘇轍《春秋集解引》，史書序如蘇轍《〈古史〉叙》、費樞《〈廉吏傳〉序》，子書序如王銍撰《〈四六話〉序》。集部分為總集與別集。總集序如孔延之《〈會稽掇英摛集〉序》、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序》、袁說友《〈成都文類〉序》。以上皆為詩文兼收的總集，此外還有單收詩歌的總集。詩總集序如楊蟠《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序》、張栻《〈南嶽唱酬〉序》。別集序如黃彥平《〈王介甫文集〉序》。詩集序有本朝人為本朝人詩集作序，如范雍《〈忠愍公詩集〉序》；也有為前朝人詩集所作的序，如張洎《〈張司業詩集〉序》。詞集序如劉克莊《〈辛稼軒集〉序》。

書序有自序，但多數為他序。邵雍《〈伊川擊壤集〉序》是一篇自序，李邕《〈王初寮先生文集〉序》、文天祥《〈東海集〉序》則是為他人所作序。有些詩文詞篇前有序。單篇詩文詞似乎很少有人請人作序，一般都是自序。單篇文序如狄遵度《鑿二江賦序》，單篇詩序如蘇洵《題仙都山鹿並叙》，單篇詞序如蘇軾《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序》。

序既然是評論該書或該篇詩詞文的文字，故其內容或論作者，或論其詩詞文作品本身，往往提出或闡

^①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二五，豫章叢書本。

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有關詩詞文的觀點，是研究宋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寶貴資料。

1. 論文評文

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九月，孫冲撰有《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①。《絳守居園池記》為唐樊宗師撰。這是一篇反對隱僻艱澀文風的重要文論。作者在《與晉守何亮書》^②中說，文章自秦、漢以來不復古，齊、梁、陳、隋不足取，唐尚對偶聲韻一體，祇有韓愈不逐時俗。樊宗師變韓之文，人莫能曉：“長慶中，樊宗師為絳州刺史，嘗作《絳守居園池記》，其詞句甚隱僻，不明白。□在京師得此文，頗與同人商榷，卒不能果然詳其意旨句讀。樊宗師又為皇唐名士，不知當時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之文大不如此。退之文集中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為文，不與世相上下，故喻以齊王好竽，商負瑟而干之。又不知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又變其體，使有聲韻偶對。唐享年尤遠，繇是鼓而成風。其間忽有韓愈，獨與張籍、皇甫湜、李翱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亦大為當時眾口排擯，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為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汨沒為人所鄙笑，今則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堯佐，陳得之，竟月不能讀，即召之，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以書謝且戲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以為其人在則其文行，蓋謂既成文而須口說之也，是知身死則文隨而沒矣，於學古也何有哉！”文章中間部分敘述他於咸平六年任絳州通判，一一以《園池記》與實際景物核對，初未曉其意。末叙重刊樊文的原委及目的：“冀後來者知文之指歸。”此文中間部分價值不大，但首尾論文章指歸，批評隱僻艱澀的不良文風，對了解北宋古文運動的背景很有意義。

范仲淹有《尹師魯〈河南集〉序》^③。尹師魯即尹洙，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年）卒，范仲淹編次其文，類為十卷，為作此序。文章前半評叙唐、宋文的演變：“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後半評尹洙：“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修）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彩，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於道歟！”這是一篇重要文論，以簡煉的文筆，清晰勾勒出唐、宋古文運動發展的過程，肯定尹洙在宋初古文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對其生平事迹僅略作概述，着重突出其臨終不亂、隱几而卒，頗見剪裁之功。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十月，蘇軾兄弟服母喪期滿，隨父入京，沿江而下，十二月抵江陵（今屬湖北）。父子三人途中所作詩文編為《南行集》，蘇軾為作《〈南行前集〉叙》^④。這是蘇軾青年時代所作的一篇文論。文章受蘇洵文貴自然，反對為文而文的影響，較為深刻地揭示出文藝與現實的關係。全文提倡“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提倡“有所不能自己而作”，“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反對“勉強所為之文”。文藝是現實觸動作者心靈而抒發出來的感情；離開“有觸於中”，就談不上文藝。

李綱有《〈道鄉鄒公文集〉序》^⑤。道鄉鄒公指鄒浩。《道鄉鄒公文集》為浩子鄒柄桂編。此序作於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着重闡明文以氣為主的觀點，認為鄒浩以危言鯁論兩謫嶺外，而氣不為之稍挫。文章後半感嘆國家治亂存乎言。此文特點也在於以氣為主，慷慨淋漓，對北宋亡於以言為諱有切膚之痛，對鄒浩犯顏逆鱗論國事充滿崇敬之情。李綱又有《古靈〈陳述古文集〉序》^⑥。陳襄字述古，著有《古靈集》。

①② 《山右石刻叢編》卷一一，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本。

③ 《范文正公集》卷六，清宣統二年重雕康熙歲寒堂本。

④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明萬曆間茅維編刻本。

⑤⑥ 《梁谿集》卷一三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此序作於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着重論述君子之文不同於小人之文,文德兼備與無德有文,是君子、小人的區別所在。序文中間部分論陳襄的為人爲文,略有些道學氣,但指責小人之文是“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鸞翰”,不僅比喻生動,而且深中古今文壇之弊。

張嶠《黃庭堅〈豫章集〉序》,《紫微集》失輯,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序謂“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也。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學詩,源流甚速”。次論其詩之源:“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仿佛者也。故其佳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再論其詩之病:“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爾……其詩雖特妙於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害騷雅處。”又論其文之長短:“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而越起。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至其爲《黃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似屈原,可以闊步古今矣,雖使柳州復生,不能出其右也。”這是一篇很有見地的序文,在南北宋之際獨尊黃庭堅時,作者能言其得失,做出較爲客觀的評價。

王十朋有《〈蔡端明文集〉序》^①。蔡端明指蔡襄。文章認爲文以氣爲主,爲文應先涵養胸中浩然之氣。這一觀點並沒有多少新意,蘇轍《上韓樞密書》已主此說。本文長處在論仁宗朝文章之盛,歐陽修、石介、尹洙、蔡襄皆當時以剛氣傑然於世者:“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范仲淹)鄱陽之貶,余(靖)、尹(洙)、歐(陽修)既與之同罪矣,蔡公(襄)乃於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爲不肖,羞其見摺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公之剛又可知也。”文以氣爲主,襄之詩文清道粹美,實出於氣之剛。

吳潜有《〈魏鶴山文集〉後序》^②。魏鶴山即魏了翁。文章論南宋文脉云:“潜竊謂渡江以來,文脉與國脉同其壽。蓋高宗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一身利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于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曆、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于建,張宣公倡于潭,呂成公倡于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吾道之所異于佛老,聖經賢傳之務息邪說,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弘矣。永嘉諸老如陳心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誇。雖未足以顛頑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然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僅止於此,悲夫!”此序頗能代表南宋道學家的文論,對南宋道學文脉的闡述十分清晰。

方逢辰有《〈誠齋文贈集〉序》^③。《誠齋文贈集》乃李誠叟取楊萬里之文爲舉子應試分門別類而編。南宋有很多這類爲舉子應試而編的書。作者認爲:“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稱美楊萬里“磊磊珂珂,挺挺介介,故發而爲文,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聲牙屈曲,波譎滄詭,艱深寒澁,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爲工哉!”對那些場屋之文大不以爲然:“大篇巨冊,

① 《梅溪先生文集》卷二七,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正統五年刊本。

② 《履齋遺稿》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蛟峰文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繁窻屹屹，猶有未能盡窺其班者，況場屋一日之士乎？”此文的意義不祇在於闡明楊萬里文章的價值所在，更在於批評了南宋文壇的不良傾嚮。

王炎有《〈松窗醜鏡〉序》^①。《松窗醜鏡》，鄭域著，已佚。域字中卿，號松窗，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進士。今所存者僅《松窗詞》一卷。這是王炎的一篇重要文論，歷評漢至宋代的文學發展。認為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歷評賈誼之後的文章云：“誼之後文章支而為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弘、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有宋，文有歐、蘇，古律詩有黃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之文掩迹乎漢、唐之文。夫自漢至今，上下二千年間，卓然名世者不三十人。噫，難矣哉！今前輩彫謝，翰墨中未聞有與古人比肩者。”末謂《松窗醜鏡》的議論以意勝，詩以格勝，詞以韻勝，而以“醜”名集，為什麼呢？除不喜自詡而喜自貶外，還因為鄭域他日之文將勝於今日之文。蘇軾晚年斂波瀾而為簡嚴，王安石晚年去繩削而為閑雅，黃庭堅晚年罷雕琢而為簡古，老筆均勝少作。全文縱論古今文學，文末寄希望於贊許，婉轉含蓄，頗有餘味。古今文學批評家都往往不滿意同時代的文學，很難對它做出公正評價。王炎認為“今前輩彫謝，翰墨中未聞有與古人比肩者”。其實他生活的年代，出現了陸游、辛棄疾、朱熹等文學巨人，惜無一語及之。

吳泳有《〈陳侍郎文集〉序》^②。陳侍郎指陳楠，字季壬，號無相居士，高宗時權禮部侍郎。首論文章祇求辭達，次論今文之弊：“今之為文者，略無古人舒暇之態。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煅月礪，不妍不止。非惟提數寸之管，敷盈尺之紙，書其所為文獻於王公大人，而名未成，蓋棺之事未定，往往編蒲鏤梓，已徧滿於書坊經肆矣。君子為己之學果如是耶……彼固知富貴之不可恃，而不知文章之麗，言語之工，亦與草木禽魚同一歸於腐壞漸盡而已。卓然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蓋有在也。”論文主旨與蘇軾同，論當時文壇之弊，尤淋漓痛快。

車若水的《〈南應焦尾集〉序》^③頗能代表南宋末理學家的文論觀。首以孔子多學多識與一以貫之之語立論，認為“故嘗謂國初之文，學多貫省者也”；批評西崑體的“作意為文”，認為“自嘉祐、元祐以及乾、淳，大學而大貫者也”，而“今之時學，則持空貫以示斯人者也。不必盡然，而區區者衆矣”。文章雖從道學家角度立論，但謂宋初之文缺乏義理，宋末之文空談義理，而北宋中葉至南宋之文學理兼勝，却十分中肯。

2. 論詩評詩

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④是一篇重要詩論，認為文乃天地真粹之氣，為文需謀、勇、正。他根據這一觀點評論歷代詩文，認為杜甫以周、楚、西漢為準的，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宋初崇尚白居易詩，同時的楊億視杜甫為村夫子，孫僅却對杜詩給予這樣高的評價，確有眼力，開宋人崇杜之先聲。

薛田有《〈鉅鹿東觀集〉序》^⑤。《鉅鹿東觀集》，魏野詩集，其子魏閑編。文章論詩文之別云：“‘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默而化之，流為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為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為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固未能臻極于淵域矣。”而魏野詩正如此。由於作者與魏野相知甚深，故對其為人和詩作的評價較為準確。強調詩不同於文就在於“發乎情”，與作者《成都書事一百韻》序中所說的非感發不

① 《宋王雙溪先生集》卷三，清康熙五十七年重校刻十二卷本。

② 《鶴林集》卷三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三台文獻錄》卷七，明萬曆刻本。

④ 《杜詩詳注》附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本。

⑤ 《鉅鹿東觀集》卷首，清抄本。

可以言詩，主旨相同。

唐異字子正，餘杭（今浙江杭州）人，善畫、工書、能詩，為士大夫所推重。范仲淹為撰《〈唐異詩〉序》^①。文章稱美唐異之詩“孑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這是一篇富有文采的詩論，力主詩歌應主乎規諫，反對西崑體之流模仿前人，無病呻吟。

蘇舜欽有《〈石曼卿詩集〉叙》^②。石曼卿即石延年。本文為蘇舜欽的重要詩論，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論詩主張。首論詩歌與現實密切相關，人含“愉樂悲鬱”之情，必借詩歌抒發：“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次論詩歌的社會功用：“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摭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煩悖，治道亡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奧耳。”文章還深刻揭示出西崑體出現的歷史背景：“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麗藻為勝。”而在此時，石曼卿却以古道自任：“惟祕閣曼卿與穆參軍伯長（修），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秀發，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率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闥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全文充分肯定了石曼卿在當時詩文革新中的作用。

紹聖四年（一〇九七年），蘇轍貶官雷州作《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③，轉錄蘇軾晚年寫給作者的一封信：“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蘇軾對陶淵明的為人和詩歌藝術特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即表面質樸而實際綺麗，表面清瘦而實際豐腴，對陶詩的特色做了準確概括。文中蘇轍評價蘇軾的詩，把蘇軾貶官黃州和嶺南兩個時期看作蘇軾詩歌創作的高峰，認為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霑然如川之方至；貶官嶺南後，蘇軾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對蘇軾的和陶詩評價尤高，從藝術成就看，蘇轍的這一評價是準確的。

李綱有《〈五峰居士文集〉序》^④。五峰居士即翁挺。《五峰居士文集》，翁挺撰，其子翁穎之編。全文闡述歐陽修詩“窮而後工”的觀點，主旨集中，從不同角度反復論述，而毫無重複之感，對翁挺的不幸遭遇充滿同情，是一篇情文并茂的序文。

王安中有《〈鄆城杜澤之詩集〉序》^⑤。杜澤之，熙寧進士，餘不詳。此序論詩“律度至嚴，資取至廣”，“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以及稱杜澤之詩“刊陳而趨新，出險而掇奇”，均表現出與江西詩派相近的論詩傾向。

① 《范文正公集》卷六。

② 《蘇學士文集》卷一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清康熙中徐惇復刊本。此文一作石介文。

③ 《樂城後集》卷二一，明清夢軒本。

④ 《梁谿集》卷一三八。

⑤ 《餘師錄》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葛勝仲有《〈陳去非詩集〉序》^①。陳去非即陳與義，南北宋之際的著名詩人。陳與義被江西詩派尊為三宗之一，但其詩風與黃庭堅、陳師道有很大不同。此序稱其洗舊徑、創新體，實指其詩已變江西詩派之體。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②的價值主要在於論述了宋代詩風的演變與反復：“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漠，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江西）宗派，斯又過之。”宋初仍不重杜詩，重杜自慶曆、嘉祐始，江西詩派推至極致，而徐斯遠却“淹玩衆作”，可見葉適是主張別裁衆體的。

韓元吉有《〈張安國詩集〉序》^③。張安國即張孝祥。文章首論詩乃志之所寓，《楚辭》乃詩之餘；次論詩人或以天才、或以學問勝，而張孝祥則以天才勝；末惜其早逝而作此序。黃庭堅論詩多主學，作者論詩與黃大異其趣，表明南宋詩風已開始擺脫江西詩派影響。

劉克莊《〈竹溪詩〉序》^④謂本朝文人多，詩人少：“唐文人皆能詩，柳（宗元）尤高，韓（愈）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可謂誅心之論。宋詩數量超過歷代，堪稱詩者寥寥；宋文成就遠遠超過宋詩，持論與嚴羽《滄浪詩話》相近。此序對了解宋代詩人的藝術趣味和宋詩的實際弊端，特別是“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語頗中肯綮，南宋詩不少是有韻的“經義策論”數語，很有參考價值。

劉克莊還有《江西詩派序》^⑤。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圖》，列黃庭堅以下二十六人。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序》，分為總序和小序。總序謂呂本中列入江西派者非皆江西詩人，江西詩人而詩風亦相近者，又不入派，不知其去取之意。小序對列入的詩人均有精闢的評論。江西詩派統治南北宋詩壇近一個世紀，此序對研究江西詩派的成員、詩歌理論、特點及各自的成就頗有價值。

舒岳祥有《〈俞宜民詩〉序》^⑥。俞宜民，未詳其人。文謂“作詩難，評詩尤難也。必具真識而後評之當，必全正氣而後評之公。故富貴者不能評，貧賤者不足評，少銳者不可評，衰老者不敢評。夫富貴者不能評，固也，而貧賤者亦莫之評，何哉？少銳者不可評，固也，而衰老者亦莫之評，又何哉？”富貴者不能評：“蓋富貴者，真識懵然，夫以科舉寸晷之長獵取顯仕，一生學問不出是矣，安能劑量詩人之銖兩也？”貧賤者不能評：“貧賤者，正氣索然，酤邊炊畔，毀譽失實，安能為人軒輊乎？不特評之者之妄，而求之者亦甚微薄矣。”少銳者不能評：“少銳者，真識未定，新涉筆墨行間，安知古人之要眇！雛鳥習飛，自謂已冥鴻舉矣，肆口談論，固先生長者之所羞也。”衰老者不能評：“衰老者，正氣已耗，方畏人之議己，而求所以自媚於後生者，故立論多恕，而擬人非倫。”後又總結說：“故非有真識不能以知人，非有正氣易至於失己。每見近時諸君喜以文人自任，而諷以詩家予人，往往不出四者之病，竊憫其然。予貧賤也，衰老也，方以自警，安敢評人乎哉！”末述作此序之由，正面提出“思尚遠而語尚近，神貴藏而色貴茂”的詩論主張：“避地香巖，馬峰俞宜民數相過，必為予出其所作，請予評之。予雖以前言自警，而宜民與予遊

① 《丹陽集》卷八，常州先哲遺書本。

② 《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二，清光緒八年瑞安孫衣言刻本。

③ 《南澗甲乙稿》卷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

⑥ 《閩風集》卷一〇，嘉業堂叢書本。

最久，欲默不可也，則語之曰：君詩如幽巖乳竇，時下涓滴。疏蘂被人，微聞香度。雖然，思尚遠而語尚近，神貴藏而色貴茂，試與君評之，非敢評君也。”宋人評詩文字甚多，但像本文這樣提出評詩需有真識和正氣的，却不多見。

3. 論詞評詞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①是一篇重要詞論，主張“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并以這一觀點評賀鑄樂府。文貴自然，是北宋古文家的共同主張，張耒把這一主張發展到極端，故其文質實少文。

陸游《〈長短句〉序》^②論詞之起源：“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篴，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特色的是詞，但宋人不太看得起詞，一般皆不入其集，而是集外單行，陸游也不例外。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③謂“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而“及稼軒橫豎爛漫，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并盡卮酒，但覺賓主酣暢，誤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此文對蘇、辛詞風的概括，特別是對辛詞產生背景的論述，十分精到。

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楊冠卿撰《〈靜寄樂府〉序》^④。《靜寄樂府》，詞集名，謝懋撰，已佚。首寫謝詞人爭傳誦，次寫其求序不久就去世了，末寫為其編集。其中，柳永軼聞、謝懋事略，均賴此序而傳。宋人的文學成就以詞為最高，却輕視詞，而楊冠卿與之相反，認為：“至理所寓，何往而不存？”

俞德鄰《〈奧屯提刑樂府〉序》^⑤雖作於入元以後，但大體可反映出宋、元之際一部分人的詞論觀點。他認為“樂府，古詩之流也。麗者易失之淫，雅者易鄰於拙，求其麗以則者鮮矣。自《花間集》後，迄宋之世，作者殆數百家，雕鏤組織，牢籠萬態，思怨爾汝，于于喁喁，佳趣政自不乏，然才有餘，德不足，識者病之”。祇有北宋蘇軾、南宋辛棄疾、金代元好問的詞，雄渾奇偉，聽者忘倦：“獨東坡大老以命世之才，遊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渾奇偉，不專為目珠睫鉤之泥，以故昌大鬻庶，如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庶幾者。下是，《折楊》《皇華》，誨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而已。疆土既同，乃得見遺山元氏之作，為之起敬。”作者論詞顯然不滿《花間詞》派，而對蘇、辛詞派却很推崇。

4. 序人與評人

序往往不僅評其文，而且評其人。蘇軾《〈范文正公集〉叙》^⑥首先敘述從學童時代開始，到寫這篇叙文的四十七年中，祇聞范仲淹之名而未能見其人的傾慕之情；然後以歷史上眾多的傑出政治家為喻，頌揚范仲淹的豐功偉業；最後纔講到范仲淹集，突出其詩賦文章必歸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而為天下師尊的特色。全文叙事嚴整，原委詳備，情文并茂。論文先論人，論人先論德，充滿仰慕之情。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值得後人借鑒。

① 《柯山集》卷四〇，民國十八年田毓璠刊本。

② 《渭南文集》卷一四，國家圖書館藏宋嘉定本。

③ 《須溪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客亭類稿》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佩韋齋文集》卷一〇，天祿琳琅叢書本。

⑥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

楊時《〈冰華先生文集〉序》^①云：“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錢世雄以蘇軾的稱許而“取重於世”，亦以蘇軾的稱許而“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這也是令人感慨的歷史現象。

李良臣有《〈九峰先生文集〉序》^②。《九峰先生文集》，蘇軾從孫蘇元老所撰。世謂韓愈之文集大成，作者認為真正集大成者為蘇軾：“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蓋匪濬匪滌，突蕩衝注，放而為長江大河，激而為驚湍怒濤，魚龍變怪之所窟宅，明珠大貝、瑰琦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浮地軸，渺渺彌彌，殆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凡也。究觀規撫，粗窺梗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發，千匯萬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呂，索之不窮，闡然益章，文至是無餘蘊矣。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從此序可看出南宋崇尚蘇軾之文已延及其後代。作者為元老門人，行文富有抒情色彩，對蘇軾、蘇元老文風異同的概括也很準確。

三、贈序文

贈序文的標題一般都是以《送×××序》《贈×××序》為題，但也有前面冠以雜說之題者，如王令《交說送杜漸》^③。此文是為送杜漸遠遊而作，稱美杜漸“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而詳述他們之間的交情。蘇軾冠以雜說標題的贈序尤多，《日喻贈吳彥律》《〈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稼說送張琥》《明正送于偁失官東歸》等都是。南宋的贈序文也有冠以雜說之題的，如李昉英的《韶石說送曲江趙廣文序》。

有些文章僅以雜說為題，實為贈序，如陳傳良的《舟說》。有些雜說雖未以雜說為題，但實際也是以雜說為贈序，如歐陽修《送楊真序》^④，文末有“予作《琴說》以贈其行”，可見此序也可作《琴說送楊真序》。又如王十朋的《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亦可題作《天理說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

贈序一般以叙友誼、道惜別、致勉勵、陳忠告為主要內容。君子愛人以德，故贈序文多規誡之語。贈序文雖為應酬之作，但一般都寫得情意真切，行文曲折，含蓄有味，抒情色彩濃厚，富有較強的文學性。

叙友誼應以道義為主，王安石的《〈同學〉一首別子固》^⑤云：“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指曾鞏，正之指孫侔，他們與王安石“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他們三人之所以“相信不疑”，就是因為他們都“學聖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〇稱此序“文嚴而格古”，張孝先稱此序“略朋友別離之情，而叙道義契合之雅，使人讀之油然而感”，確實把握住了此文的特點。

鄭剛中的《送石尉序》^⑥是一篇“道惜別”的贈序，此序首引唐李益《送洛陽留守》詩“還似汀洲鴈，相逢

① 《楊龜山先生集》卷二五，清康熙四十六年楊氏重刻本。

②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

③ 《廣陵先生文集》卷一二，嘉業堂叢書本。

④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二，宋慶元二年周必大編刻一百五十三卷本。

⑤ 《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一，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撫州刻本。

⑥ 《北山文集》卷五，金華叢書本。

又背飛”，抒發自己與石德臣相逢而又相別之情。次叙爲什麼相逢而又相別：“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爲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與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爲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群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牆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跼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部使者皆得辭請，一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最後作者以感慨作結：“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末以安慰作結：“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雛於前途！”全文通過“道惜別”，對北宋末年吏治腐敗深表不滿，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

致勉勵是贈序文的主要內容，即使以其他內容爲主的贈序文，往往也含有勉勵之詞。蘇軾《送水丘秀才叙》^①前寫水丘“必有用”：“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礪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而仙夫却頗“自惜”：“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琅琊，之會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最後作者提出處世的兩種態度，勸水丘不要“習而不試”：“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勉”就是此序主旨。其他如司馬光《送胡完夫序》^②、李清臣《送康侯之官序》^③、陳師道《送邢居實序》^④、陸佃《送李泰叔序》^⑤、劉辰翁《送人入燕序》^⑥等，都是致勉勵之文。

劉敞的贈序文較多，有十八篇。他的《送從父弟歆序》^⑦是一篇典型的“陳忠告”的贈序，全文幾乎都可以作爲座右銘。因是送從弟，故言多質直，不事婉轉：“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內直者，與天爲徒；外屈者，與人爲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怠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群；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則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則衆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況泰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爾其以此矣。”曾鞏的《送周屯田序》^⑧也是一篇陳忠告的贈序，寫對致仕的應有態度。

贈序文的內容並不都是分別以叙友誼、道惜別、致勉勵、陳忠告爲內容，更多的是以上內容的綜合；也不是叙友誼、道惜別、致勉勵、陳忠告所能完全概括的，還有其他方面的內容。

有的抒發感慨，如蘇軾的《送張道士叙》^⑨把贈人以言比作發藥治病，但其特點不是蘇軾向張道士贈言發藥：“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而是乞張道士向自己贈言發藥：“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其下即爲蘇軾的自我抒慨：“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

①⑨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

②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四，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紹興刻本。

③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七。

④ 《後山居士文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宋刻本。

⑤ 《陶山集》卷一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 《須溪集》卷六。

⑦ 《公是集》卷三五，傅增湘校補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⑧ 《元豐類稿》卷一四，清康熙五十六年顧崧齡刻本。

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望吾友也。”“明於處己，暗於接物”，“與物日忤”，“能圓而不能方”，“能直而不能曲”，“適吾所自適”等，確實是蘇軾的性格。其他如歐陽修《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①、王安石《送陳興之序》《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②、晁公邁《送王子載序》^③、劉子翬《招劍文送劉致中》^④、俞德鄰《送牛子明序》^⑤等，都是抒發感慨之作。

有的自明己志。向敏中是太宗、真宗朝的宰相，他的《留別知己序》^⑥就以明志為主要內容。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謂此文表現了“本朝名輔相飭己立志之方”。文章開頭就說：“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此為全文主旨。他從地方上被命還朝，“同年執（摯）友，通才巨儒，咸貺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為進身之望也”。他認為這些“激揚之意”“潤色之詞”，都不如“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偽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心愈踈。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蠹螫，面作狐狸，縱峨冠鳴佩，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此序不僅表現了他“飭己立志之方”，而且表現了贈別之詞不應滿足於“激揚”“潤色”，而應“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

有的稱許其人，如范鎮《送彭學士序》^⑦就以稱頌彭乘興學為主要內容。彭乘與作者同為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天聖八年（一〇三〇年）知普州（今四川安岳），以興學著稱。後知荊門軍（今湖北），此序即為送彭赴荊門而作。但未在荊門上着墨，而是先簡明概括蜀中歷代文化的興盛：“蜀當西南陬曰與坤，坤為文為臣，故世有方正柔靜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後王褒、何武、揚雄事業著于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峨蘊精，江漢畜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然後以主要篇幅稱頌彭在普州的興學：“縣令前驅，駑駘甚寵。子弟帥教，檄文不修。里有冠蓋之華，家連序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堂、子雲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勸悅之道，其利博哉！昔楊仲桓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立本朝，議外廷，絲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夫未量其被教育也。”而對彭知荊州，僅文末一筆帶過：“南荊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無述。”這樣寫，既是對彭的頌揚，又暗含安慰之意（荊州“非久留之地”），且不落俗套。

贈序文的結構一般與其他文章無別，但古代贈人以言多數是贈詩，贈序文即從贈詩之序而來。魏了翁《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⑧：“元老將歸省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各為七言古詩一章，予為序所以作云。”舉行送別宴會，與會者各贈詩，而由一人再撰序以作交代，如蘇軾《送杭州進士詩叙》^⑨。後來纔發展成獨立的文體，故在贈序文的末尾仍往往附以詩，以“擊缶而歌”作結。

①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二。

② 均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

③ 《嵩山集》卷四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屏山集》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佩草齋文集》卷一〇。

⑥ 《皇朝文鑒》卷八五。

⑦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六。

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刻本。

⑨ 《蘇文公忠全集》卷一〇。

曾鞏的《送江任序》^①較為特別，由平行的兩扇組成。宋王朝任用官吏，多不讓在本地作官，而且實行三歲一遷的制度，這對防止吏治腐敗是有益的。曾鞏對此却大不以為然，前段論用於異鄉之難為治，後段論用於本土之易為治。末言江任，臨川人，任豐城知縣，而臨川、豐城，均為江西屬縣。“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〇二評此序云：“古來未有此調，出子固所自為機軸。”此序內容完全不涉及“叙友誼、道惜別、致勉勵、陳忠告”，而是兩幅對峙：“前面直是兩扇文字。”^②最後以交代本事作結，是曾鞏自創此格。

宋人喜破體為文，即不按這種文體的一般格式寫作。歐陽修的《送陳經秀才序》^③是以游記的寫法寫贈序，前以一半的篇幅寫洛陽龍門之勝，中寫達官貴人“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僕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能得伊水龍門之遊樂“惟卑且閑者宜之”。末段寫自己與陳經等閑者常游於此，祇有末句纔點明是為贈行而作。孫琮評此文云：“通幅讀去，竟似一篇游記，讀至尾一行，纔是送人文字。”^④

蔡襄《送史炤赴邠州幕序》^⑤則是以駁論的寫法寫贈序，反駁陸贄“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之論：“襄竊謂陸生一時之辨，非極論也。”因為“夫將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副二乃適，豈待乎安危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橫舟中流，指山木以為楫，曰不殆者，豈為智乎？”接着又以國家的現狀論證這一問題，當時“天下雖安”，但“四十年間，卒老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實不可忘兵。全文結構雖是一篇駁論，但駁陸贄正是為了向史炤“陳忠告”：“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

贈序的對象有上贈下、下贈上或同輩相贈的區別。根據所贈對象的不同，語氣也往往不同。同輩間的贈序如王十朋的《送喻叔奇尉廣德序》^⑥以“叙友誼”為主，是以頌為誠：“至若清白以處己，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學而優為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把對喻叔奇的“深望”，說成是他的“素學而優為”，這就十分婉轉。

上贈下的贈序不妨直質，施峻從學於胡銓，中途因其父官滿而去，故胡銓作《送施峻序》^⑦以贈之，是以老師的身份送學生，故較直，中心是講學不可半途而廢。

下對上的贈序文最難寫，陳忠告似不禮貌，道盛德又似阿諛。袁說友《送趙運使赴召序》^⑧謂贈序“施之等輩則為勸，行之先生長者則為薄，是故不可以不審”。他認為即使是下對上的贈序也應“無失乎贈言之意”，即“致勉勵，陳忠告”。而當時下對上的贈序多“誦古今，道盛德”，他却“不欲以亡益之辭而塞贈言之責”。如果或稱趙之學，或稱趙之行，或稱趙之公，“切切然以稱咏為美，先生何樂乎此哉！”他認為“贈言之勸，以忠而不諛”。

贈序文雖多以“致勉勵，陳忠告”為內容，但需婉轉。蘇洵《送石昌言使北引》^⑨是一篇十分曲折婉轉的贈序文。全文僅四百來字，表面看，蘇洵似乎沒有一句直接規諷石昌言的話，但實際上都是在“致勉勵，陳忠告”，希望石昌言要不辱使命，不要被敵人的氣勢汹汹所吓倒，要敢於折沖口舌之間，敢於藐視敵人，奪取

① 《元豐類稿》卷一四。

②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儲欣評。

③ 《歐陽文忠公集》卷六四。

④ 《山曉閣選宋大家歐陽廬陵全集》卷三。

⑤ 《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二六，清雍正十二年福建蔡氏遜敏齋刻本。

⑥ 《梅溪先生後集》卷二七，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正統五年刊本。

⑦ 《胡澹安先生文集》卷一六，清道光十三年胡文思重刊本。

⑧ 《東塘集》卷一八。

⑨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一五，明刊本。

外交上的勝利。行文宛轉曲折，意在言外，言者并未傷人，聞者足為鑒戒。

為了使贈序文達到婉轉的目的，宋人用了很多手法。一是以故事寓規戒，如李燾《送湯司農歸朝序》；二是變忠告為請對方自擇，如曾鞏的《贈黎、安二生序》；三是以共勉代直接告戒，如王蘋的《送李子勉序》；四是以自警陪襯戒勉，如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五是借稱頌以致勉勵，如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六是以“知其能”如此，代替直接“致勉勵，陳忠告”，如王安石的《送孫正之序》；七是以不言為言，也是一種委婉的方法，如游九言《送趙主簿紫芝序》；八是引而不發，如邵博《送呂莊夫序》；九是以相反之語相戒，如歐陽守道《贈劉登龍》；十是以自己關心的問題告誡友人，也是一種行文婉轉之法，如周紫芝的《別子劉子序》。

四、字序(說)

字序即字說，有很多異名。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為一類。”又謂字說包括“字說、字序、字解、字辭、祝辭、名說、名序、女子名字說”，均含丁寧訓戒之義；“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戒之義無大異焉……近世多尚字說，故今以說為主，而其他亦並列焉”。字說所施雖異，但其內容仍在說明取名取字之理，與說無異。

屈原《離騷》開篇即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這是屈原自報家門，他說自己是古帝顓頊（高陽）的後代，他的父親（朕皇考）叫伯庸。攝提，星名，它一年四季隨着斗柄指嚮不同的方位；貞同正；孟陬，正月初春；降，降生。“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是說他降生於正月初春的庚寅日。皇即皇考；初度，初生時節；肇，肇始，開始；錫同賜；嘉，美好。“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即父親觀察、估量我的初生時節，開始賜給我美好的名字。什麼美好名字呢？“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屈原名平字原，“正則”，公正而有法則，暗含“平”字；“靈均”，美好而平坦，暗含“原”字。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也說：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可見名與字在先秦就已出現了。

中國古代的稱謂很複雜，有姓、名、字、號之別。姓是用來區別家族的，名是用來區別個人的。柳開《名系》^①云：“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并舉“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名身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也”。歐陽修《胡寅字序》^②也認為名“未嘗有義”，而字“似若有義”，是用以“釋其名”的：“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并不一定要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直識其次第而已。”

但從多數古人的取名看，一般是含有意義的。蘇洵《名二子說》^③，為二子取名軾、轍，就有深刻的喻意。軾是車上用作扶手的橫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他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蘇軾性格豪放不羈，鋒芒畢露，確實“不外飾”。結果一生屢遭貶斥，差點被殺頭。轍是車子碾過的印迹，它既無車之功，也無翻車之禍，“善處乎禍福之間”。蘇轍性格沖和淡泊，深沉不露，在以後激烈的黨爭中，雖然也屢遭貶斥，但多數是受蘇軾牽連，並終能免禍，悠閑地度過了晚年。文章以車上扶手（軾）和車輪碾過的軌迹（轍）作比喻，說明蘇軾兄弟取名的由來，對他們的不同性格做了十分準確的概括，表現出作者的希望和擔心。全文僅八十餘字，但在引物托喻中，遠能見近，侈能盡約，小能使著，全文無一直筆，句句轉折，在無限婉轉之中，傳達出無限情思。楊升庵《三蘇文範》卷四評此文說：“字數不多而婉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觀，此

① 《河東先生集》卷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歐陽文忠文集》卷六四。

③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一五。

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

至於名與字的關係，字是表名的，名與字應相配。歐陽修《胡寅字序》認為：“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寅有“恭且畏”的意思，故歐陽修以“子畏”為胡寅的字。羅浮山道士何宗一的猶子，蘇軾《何苓之名說》^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因為“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這也是典型的以字表名。李之儀為祥瑛上人取字“瑩中”，其《祥瑛上人字序》^②闡明了瑛與瑩的關係：“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

蘇洵之兄蘇渙原字公群，蘇洵認為不恰當，其《仲兄字文甫說》^③云：“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於是應兄之請，“以‘文甫’易之”。

朱廷隱原字深甫，周行己認為深甫“與夫名義違而不得以表其實也”，故為他改字曰“大隱”。其《朱廷隱字大隱序》^④謂大隱隱於朝，與廷隱之名正相配，而廷隱、大隱都是“假其位以行其道”，“有志乎致君澤民”，以防止他“翻然樂林藪之逸”，“以佐其志而進也”。此序也揭示了名與字的關係：“字，君子之美稱也，所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也。”

從上舉字序不難看出，字序實為雜說，說明取名取字的理由以及名與字的關係。有的字序就題為字說，如蘇軾的《文與可字說》《楊薦字說》《文驥字說》《張厚之忠甫字說》《趙德麟字說》等。即使題為字序，實際也是說，如江存之求字於蘇軾，蘇軾為“字之曰‘子靜’”，并撰《江子靜字序》^⑤，這篇字序就與字說無別。全文從存亡、得失、喜怒、是非、真偽等方面極論“動以靜為主”，表現了蘇軾一貫的以靜制動的思想，目的是要江存之“靜以存性”：“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有些以序為題的文章，本來就是一篇論說文，這也從側面證明字序的序實為雜說，如宋白《弈棋序》^⑥就完全是一篇以小喻大、以弈喻政的論說文。文章開頭就說：“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所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中間一大段論“弈人之說”，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後段引申為論政：“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刳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首，得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圍棋，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字序既為論說文，故以議論勝，但也有少數字序以描寫勝，不過這種描寫也是為議論服務的。如蘇洵的《仲兄字文甫說》。陳淵《鄧德恭字序》^⑦也以描寫勝：“余友鄧南夫之子名肅，請字於余，余字之‘德恭’。

①⑤ 《蘇文忠公全集》卷一〇。

② 《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五，粵雅堂叢書三編本。

③ 《蘇老泉先生文集》卷一五。

④ 《浮沚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 《皇朝文鑒》卷八五。

⑦ 《默堂集》卷二〇，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抄本。